第 38 卷 第 6 期
2012 年 6 月

财经研究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38 No. 6
Jun. 2012

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机制与实证
——基于效应分解视角的中国省级区域数据研究

万　勇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文章从效应分解视角出发，将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分为结构效应、交易效应、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四个方面，并采用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 2000—2009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的结构效应和保障效应不明显，城市化增强了交易的可获得性、交通的方便性，但没有提升居民信息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为此，要加强新进城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城市房价合理回归，打破信息产业的垄断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城市化；居民消费需求；机制；实证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2)06-0124-10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征。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受到很大的负向影响，意味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关注自然转向居民消费需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需求会上升。然而，我国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上升到 2009 年的 46.59%，30 多年来城市化率提高了近 1.5 倍，但是最终消费率却从 1978 年的 62.1%下降到 2009 年的 48.0%，30 多年下降幅度达到 22.7%。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与最终消费率呈反向变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没有带来消费水平的提升。对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措施。然而，观察其效果可以发现，内需不足仍是困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何城市化处于快速上升期却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驱动作用有限呢？中国的城市化没能有效刺激居民消

收稿日期：2012-02-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03205）；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452500002005996）

作者简介：万　勇（1977—），男，江西九江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费需求的原因究竟何在?

刘易斯指出,由于城乡间存在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的差异,农村人口会向生产率、工资水平高的城市转移,这种趋势会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水平。Fujita 等(2000)和 Venables(1996)证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会产生多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如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效应和信息技术的外溢效应等,从而得出城市化会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范剑平和向书坚(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居民消费率的贡献几乎为零。余芳东(2010)通过国际对比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提升并没有拉动国内需求增长,并且我国居民消费在规模、水平、增长速度和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相反的证据也存在。刘艺容(2008)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与消费增长率间总体上具有正向的互动影响,且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一些学者针对我国城市化快速提升而内需却不足的现实困境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文贯中(2010)认为,城乡人口结构变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导致的城市化滞后带来的服务业发展失衡,是我国国内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王翔(2010)提出,要实现经济拉动方式由投资和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应从城市道路、城乡经济、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努力。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在城市化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的研究,缺乏从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角度展开的论述,从而无法对中国城市化与居民消费需求脱节问题做出深层次的解释。本文将首先从效应分解视角出发,解析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并据此建立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化与内需脱节的成因。

二、基于效应分解视角的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

城市化是一个宏观的、综合的历史发展过程,其构成因素如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的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有着错综复杂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理解为这些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过程,并根据这些因素的作用特征将其作用归结为结构效应、交易效应、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因此,城市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驱动作用可理解为这四个效应的总和。

(一)结构效应。农村人口转换为城市人口后,由于原有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对进城人员具有“示范性”作用(Duesenberry,1949; Carroll 等,2000),进城人员的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消费占家庭总支出比重逐步下降,文教娱乐、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高层次消费需求比重将逐步上升(周建和杨秀祯,2009)。这样,进城人员消费偏好改变,消费结构从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转变,带动整体消费结构的升级。在更高层次的消费结构下,居民消费总额会增大。

城市化还会推动就业结构的变迁。城市化通过创造更多的服务业岗位、

提供更多的工业生产机会，将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转换为城市人口，并将其工作领域从第一产业领域转换为第二、第三产业领域。一般来说，第二、第三产业领域的收入相对于第一产业而言要高些。因此，就业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从而为拉动居民消费创造条件。

无论是就业结构还是消费结构，二者的变化都有助于拉动居民消费，本文将这两种结构变化对消费的驱动作用称为“结构效应”。

（二）交易效应。一方面，城市完善的交通通信等条件为进城人员获取就业、创业以及培训等信息提供了可能，并极大地降低了这方面的信息搜索与获取成本。另一方面，城市便利的购物环境、密集的资讯沟通等为进城人员进行不同层面的交易活动提供了强大的桥梁中介。因此，城市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驱动作用不仅体现在以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为先导的结构效应上，还体现在降低交易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交易成功率等方面的交易效应上。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城市，先前为少数人服务的城市商业服务模式无法适应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连锁经营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网上购物等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这极大地降低了间接市场交易的费用，产生了降低间接交易成本的交易效应。同时，相对农村而言，城市化带来更发达的电信、邮电、广告等现代信息传播系统和更密集的人际传播渠道等，能给进城人员在生产采购、生活消费、就业岗位寻找、创业机会搜寻等方面提供更低廉、有效的信息服务，从而也能降低市场交易的直接费用，并最终有利于进城人员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扩张。

（三）保障效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相对于农村，城市不仅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收入，还能够提供一些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或即使能享受到但优惠幅度远远达不到城市水平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同时，城市的医疗水平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为进城人员身体健康、子女教育等提供了保障。在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下降，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减小，居民消费信心增强。也就是说，城市化为进城人员的生理、生活乃至发展提供了更强的保障，具有保障效应。在城市化的保障效应作用下，居民会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转化为当期消费，从而带动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

（四）收入效应。首先，城市化推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效率，从而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其次，城市化能推动人力、财力与物力向城市集中，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生产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出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最终为人们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最后，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获得比在第一产业更高的收入。因此，城市化能推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收入效应。在收入效应这个巨大的杠杆

作用下,居民消费总额被放大。

上述论述可用图1总结。图1表明,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过程是结构效应、交易效应、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四大效应的综合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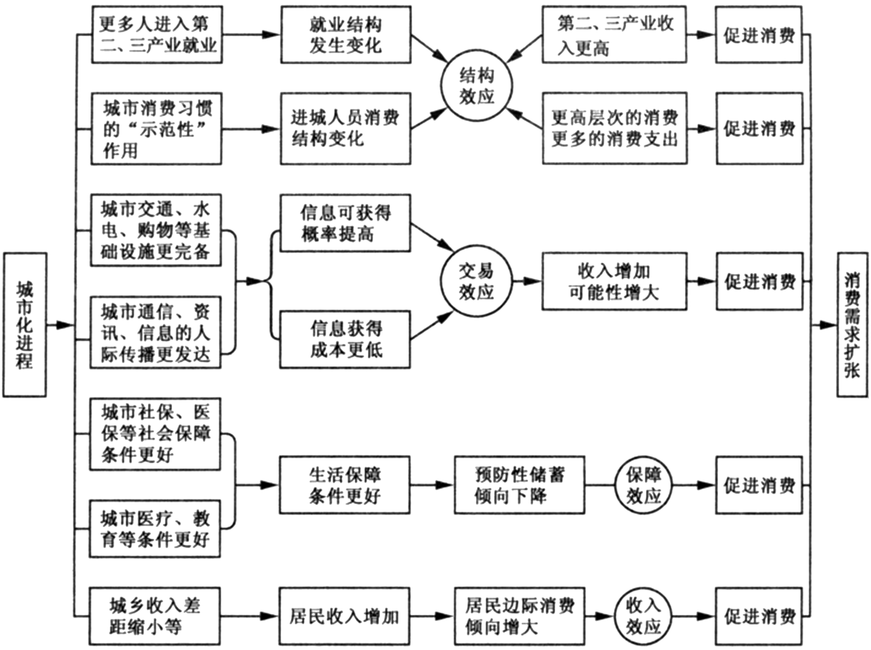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效应分解视角的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

根据上述分析,设消费需求为C,则有:

$$C=f(S,T,P,I) \tag{1}$$

其中,S为结构效应,T为交易效应,P为保障效应,I为收入效应。不难发现,四大效应与消费需求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也即:

$$\partial C/\partial S>0,\partial C/\partial T>0,\partial C/\partial P>0,\partial C/\partial I>0 \tag{2}$$

进一步,假设式(1)各变量间存在如下关系:

$$C(S,T,P,I)=S^{\alpha}T^{\beta}P^{\gamma}I^{\theta} \tag{3}$$

对式(3)两边求自然对数,可得:

$$\ln C=\alpha\ln S+\beta\ln T+\gamma\ln P+\theta\ln I \tag{4}$$

式(4)表明,城市化推动的消费需求量的自然对数是S(结构效应)、T(交易效应)、P(保障效应)和I(收入效应)四者自然对数的线性组合。

三、面板数据模型

(一)指标体系构建。对于城市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驱动作用,本文理解

为结构效应、交易效应、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四大效应的总和。这里为四大效应设置不同的子部类,以说明各效应的不同方面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并在子部类下,设置具体的统计指标以便更准确地表征子部类特征,具体符号含义及其表征对象见表1。

表1 城市化四大效应指标体系

四大效应	子部类	具体统计指标	符号
结构效应	就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S^1
	消费结构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与食品消费的比例	S^2
交易效应	交易可获得性	各地区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零售额	T^1
	交通方便性	年末公共交通运营数	T^2
	信息可获得性	各地区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就业人数	T^3
保障效应	养老保障	各地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P^1
	医疗保障	各地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P^2
收入效应	城市增收效应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I^1
	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I^2

(二)计量模型建立、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拟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ln C_{it}=\alpha_1\ln S^1_{it}+\alpha_2\ln S^2_{it}+\beta_1\ln T^1_{it}+\beta_2\ln T^2_{it}+\beta_3\ln T^3_{it}$$
$$+\gamma_1\ln P^1_{it}+\gamma_2\ln P^2_{it}+\theta_1\ln I^1_{it}+\theta_2\ln I^2_{it}+\varphi_1\ln C_{it-1}\varepsilon_{it} \tag{5}$$

其中,$i=1,2,\cdots,31$;$t=2000,2001,\cdots,2009$。i表示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t表示年度,为2000—2009年。式(5)中以城市化进程的四大效应的子部类作为解释变量;以居民最终消费支出C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历年各地区按支出法计算的最终消费支出数值。考虑到消费习惯的作用,本文还将最终消费支出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以观察前期消费对即期消费的影响。

式(5)中具体指标含义见表1。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2000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000—2001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以及2006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数据。对此,我们用下式处理:

$$X_{it}=\frac{X_{it+1}}{X_{it+2}/X_{it+1}};\ i=1,2,\cdots,31;\ t=2000,2001 \tag{6}$$

其中,X_t为缺失年度指标数据,X_{t+1}为缺失年度后一年数据,X_{t+2}为缺失年度后两年数据。

为了消除物价水平变动对变量的影响,本文以2000年为基年,利用各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相关数据转换为2000年不变价格。同时,为消除数据的非平稳性并符合模型的要求,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三)面板数据模型选择。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即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F协方差检验和Hausman检验,以区分采用模型的种类。F协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建立混合模型的原假设。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综合F协方差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见表2)。

表2　面板数据模型选择

F协方差检验	F值 4.395	自由度 (30,237)	5%临界值 1.66	检验结果 拒绝混合效应
Hausman检验	χ^2值 88.099	自由度 10	5%临界值 18.31	检验结果 拒绝随机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份2000—2009年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指标	系　数
截　距	−0.423(−0.994)
S^1	−0.007(−0.304)
S^2	−0.004***(−3.308)
T^1	0.018***(3.377)
T^2	0.099***(2.893)
T^3	−0.025(−1.080)
P^1	0.035***(3.024)
P^2	−0.033(−0.995)
I^1	0.460***(6.047)
I^2	−0.337***(−4.239)
C(−1)	0.474***(8.736)
调整的R^2	0.997
DW值	1.927
F值	2 106.988

注:(1)*、**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2)括号内为t检验值。(3)限于篇幅和研究目的,截距项不含31个地区的固定效应。

(一)结构效应。在就业结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中就业结构的转变对居民消费需求提升作用不明显。由于本文衡量就业结构效应的统计指标是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城市化进程看,就业结构对居民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的原因可能在于:新进城人员虽然实现了工作领域的转变(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或第三产业),但其工作岗位的报酬相对同领域劳动者而言偏低。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脱离了农业劳动进入工业或服务业领域,但相对而言,由于他们的知识技术水平较低,加之在新岗位上属于“生手”,他们一般处于第二、第三产业体系中技术含量较低、报酬较低的工作岗位,进城后收入提升效果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新进城人员虽然实现了工作领域的转变,但由于所处具体工作岗位报酬相对城市“原居民”要低,还无法实现从低收入向相对“体面”收入状况的转变,从而制约了进城人员收入的提升,并最终限制了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

在消费结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S^2(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与食品消费的比例)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效应为−0.004,因此可以认为,当前居民消费结构制约了国内居民整体消费需求的扩张。从城市化进程来讲,一方面,由于新进城人员自身技能水平较低,所处岗位报酬较少,导致其家庭收入较低,从而延缓了其家庭消费结构从原先的衣食为主的温饱型向文化娱乐教育为主的发展型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价格不断攀升,为了在

城市购房安家,进城人员需要将收入中的大部分用在购房或还贷上,这样必然会压缩在文化娱乐教育等方面的消费开支,从而也不利于消费结构的转型及由此带来的消费扩张效应的实现。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尚未实现有效升级,依然处于以衣食为主的温饱型阶段。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0—2009年,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上升趋势较明显,而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则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低层次的消费结构不利于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对扩大国内消费形成严重制约。

(二)交易效应。本文将交易效应分为T^1(交易可获得性)、T^2(交通方便性)和T^3(信息可获得性)三块。由表3可知,2000—2009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交易可获得性和交通方便性都在增强,二者在统计上也表现出对居民消费支出的显著正向效应。其中,居民消费对交易可获得性的弹性为0.018,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居民消费对交通方便性的弹性为0.099,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第一,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居民进城带来了大量的人流与物流,促进了城市批发零售商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批发零售商业的繁荣及由此而来的店铺布局的均衡化和便利化极大地方便了居民购物,增强了居民交易的可获得性,从而有效降低了居民交易成本并提高了交易效率,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驱动作用明显。第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带来了城市公共汽车、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既形成了对投资需求的强大拉力,又大大方便了居民的工作和生活,从而有效降低了居民交易成本并提高了交易效率,为居民消费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交通方便性作用下,居民消费欲望得到充分满足,消费潜能得到较好发挥,消费需求增长得以实现。

然而,并非所有的交易效应都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表3显示,信息可获得性T^3对居民消费需求驱动作用不明显,表明以城市电信、网络、有线电视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传播工具对居民交易成本下降和交易效率提升效果不显著。本文认为,这可能与当前我国电信、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行业的垄断性质有关。众所周知,当前无论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还是中国联通,均是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在垄断竞争模式下,我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平均通话费以及网费都较高。高额的信息费用达不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从而阻碍了信息可获得性作用的发挥,T^3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因此而不显著。

(三)保障效应。本文将保障效应分为P^1(养老保障)和P^2(医疗保障)两块。计量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上,P^1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积极效应,但对其弹性较小,仅为0.035,说明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微弱的拉动作用。P^2的回归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医疗保障体系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总体来看,在养老保障方面,虽其效应显著但弹性很小,仅为0.035,即养老保障能力提升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提

升不到 0.04 个百分点;在医疗保险方面,效应则不显著。这说明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驱动作用不够明显,保障效应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一个统一的、覆盖全国城乡所有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居民而言,社会保障覆盖能力和覆盖面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进了城但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因此对未来生活的顾虑加重,不可能很好地融入城市,从而限制了其消费需求的提升。

另外,我国社会保障还面临社保基金筹措困难、“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的社保待遇差异大、社会保障制度在“东、中、西部”极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对社保体系影响大等诸多问题,这些现实问题也进一步加深了居民对未来生活的担忧,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提升效应因此而不够明显。

(四)收入效应。收入效应分为城市增收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程度两部分。由表 3 模型回归结果可见,城市增收效应的回归系数较大,为 0.46,并且在 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确实具有增加收入的作用,因而在收入看涨的带动下,进城人员的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表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收入差距提高 1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降低 0.337 个百分点。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

由收入效应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增加收入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从根本上导致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而且由于进城人员是农民,其前期收入积累都是从农村相关产业领域取得,在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巨大的财产差距的条件下,进城人员进城初期面临财产积累上的不利局面,因此其消费需求会降低,从而对全社会消费需求具有消极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结构效应不明显。上述实证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需求方面的正向结构效应,表现为:一方面,就业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作用不显著;另一方面,由于居高的房价、新进城人员报酬较低等原因,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无法进行升级转型,从而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负向影响。结果还显示,温饱型消费仍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导模式,21 世纪初期我国的城市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为此,一方面要加强新进城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报酬,促进就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要加强保障房建设,促进城市房价合理回归,推动消费结构升

级。具体来说,要以保障性住房建设为重点做好房地产调控,控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努力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促进城市房价合理回归。

(二)城市化增强了交易的可获得性和交通的方便性,但并没有带动信息可获得性的提升。交易效应方面的实证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批发零售商业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兴起方便了居民交易行为,增强了城市交易的可获得性,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对消费需求的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以城市公共汽车、道路等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增强了城市交通的方便性,也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从而拉动了居民消费需求。但以电信、网络为代表的城市现代信息设施产业因其垄断性质和居高的价格而限制了居民的信息可获得性,从而不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提升,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为此,要推动信息产业体制改革,加强政府监管,打破垄断,提高居民信息的可获得性。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保障效应不明显。保障效应方面的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存在社会保障面不够宽、社保基金筹措困难、“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的社保待遇差异大等诸多问题,保障效应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此,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发挥保障效应。具体来说,要加快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完善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尽快完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将城镇无业居民群体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要取消社保待遇地域障碍,实现社会保障待遇的“异地漫游”。

(四)进城生活能带来收入增加并有助于消费提升,而城乡收入差距则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实证结果显示,进城为农民提供了收入增长的新契机,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提升,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使进城人员面临进城初期财产积累上的不利局面,并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而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此,要推动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收入效应发挥。当前,要统筹城乡发展,创建平等的就业环境,保障农民的正当土地收益,完善农产品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加强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投入。要促进人口的流动和农村地区工商业的发展,鼓励对农村的投资,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要完善政府财政支出制度,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转移支付,增加农民收入。

主要参考文献:

[1]范剑平,向书坚.我国城乡人口二元社会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J].管理世界,1999,(5):35-38.

[2]余芳东.扩大我国居民消费潜力的国际比较研究[J].统计研究,2010,(6):29-32.

[3]刘艺容.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拉动消费增长的持久动力[J].消费经济,2005,(4):31-35.
[4]文贯中.结构性失衡、内需不振、过时的土地制度和走出困局之路[J].南开经济研究,2010,(2):17-27.
[5]王翔.以城市化驱动消费的现实悖论——兼论我国经济拉动方式的转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4):26-31.
[6]周建,杨秀祯.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09,(1):83-95.
[7]Fujita M, Krugman P, Venables A. The spatial economy[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8]Carroll C, Overland J, Weil D. Saving and growth with habit 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3): 341-355.

Empirical and Mechanism Study on the Increase in Residents' Consumption Demand Driven by Urbanization: Based on Provincial Data in China from the Angle of Effect Decomposition

WAN 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Maoming* 525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effect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divides the functions of urbanization in driving residents' consumption demand into structure effect, trade effect, security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and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covering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0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and security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 not significant; urbanization enhances the availability of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but does not raise the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the widen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curbs residents' consumption demand. Therefore,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occupation training for new immigrants in cities, promote reasonable regression of house prices, breach the monopol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perfe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shorte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demand; mechanism; empirical study

(责任编辑　许　柏)